

江南文化研究

21世纪言子研究综述

王 燕

摘要：进入21世纪以来的20多年，是言子研究获得新进展的重要时期。这种新进展主要表现在传统研究和拓展研究两方面的突破。本文全面展示言子传统话题的研究成果，如籍贯年龄、子游文学、子游学派、言子思想及影响等方面的新进展；同时对言子思想进行再诠释，对重塑言子在中华文化史上的历史地位等拓展话题的研究成果进行反思与展望，以期彰显言子思想的当代传承和价值。

关键词：言偃；子游文学；游夏文学；思孟道统；子游学派

言偃，作为儒学宗师孔子入室十哲中唯一的南方弟子，以“道启东南”“文开吴会”彪炳中华文化史，对江南儒学的开创与发展有巨大的贡献，历来受到学人的关注与探研。进入21世纪以来的20多年，是言子研究获得新进展的重要时期，不仅研究成果较多，而且研究水平得到提升。这种新进展，主要表现为两个突破：一是在传统研究话题上的新突破，如言子的学派研究、思想研究和影响研究呈现深化趋势；二是在拓展研究话题上的新突破，主要表现在文本研究，如《礼运》《性自命出》等，尤其是大同小康思想的研究成果颇丰，紧密联系实际，成为学界特别关注的话题。本文着重关注21世纪言子研究的推进成果，总结、分析和反思当下言子研究现状，展望新的历史时期如何进一步深化言子及其思想研究，重塑言子在中华文化史上的历史地位，充分彰显言子思想的当代传承和价值。

一、言子研究传统话题的推进

第一，关于言子籍贯年龄的研究——吴鲁之争与生年考证。由于传世史籍失载言子籍贯，因此其籍贯的国别问题成为两千年来学界争论的话题。历史上主要存在三种说法，即吴人说、鲁人说和调和说。其中调和说认为言子既为鲁人又为吴人，如高专诚认为言子祖上为吴人，后辈多居鲁地，^①这实际上是承认言子是吴人，所以人们普遍排除调和说，真正聚讼之处还是吴鲁之争。吴人说源自《史记》记载，三国时期魏国经学家王肃认定：“言偃，鲁人，字子游……以文学著名。”^②由此，吴人说和鲁人说并立，争执

① 高专诚：《孔子·孔子弟子》，第289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

② [三国]王肃整理：《孔子家语》，第182页，扬州：广陵书社，2023。

延至当代。吴人说主要依据是言子遗存,如言子宅墓、墨井等,这些历史遗迹都在常熟;唐宋先后加封言子为吴侯、丹阳公、吴公,这些都是江南地名。官方祭奠先哲历来严谨,因此吴人说普遍被人接受。但鲁人说仍有学者坚持,主要理由有二:一是吴、鲁相距数千里,言子北学中原在当时应是非常困难的事,传记为何没有提及;二是孔子逝后,孔门弟子多归故国,而言子长期在鲁活动,子孙亦居鲁国,老年才南归。曹建国认为言子是鲁人,而非吴人,吴人当为方言“郟人”之误,^①就子游的籍贯问题,我们或许可以承认《家语》记载的是真实情况,而后人对《史记》记载理解有误,“推测子游实是鲁国的‘南武城’人,或为靠近‘南武城’的‘吴人’,这才有了他是‘吴人’还是‘鲁人’的争端”^②。对于曹建国等的鲁人说理由,邹旭光取否定态度,“据考,春秋后期吴、鲁接壤,两国接壤处,约相当于今苏北与鲁西南交界处。吴人就学于鲁,何需‘涉数千里而北’哉……且传记并不是‘皆无一言及之’”。其次,孔子去世后,言子与弟子守孝三年,“考子游的去向,则是归于吴”。《礼记·檀弓》篇中有“越人来吊”章,其“越人”正是指子游。^③王若诗也否定曹建国等的鲁人说,“一来传记无征不能作为子游不曾北学的理由,二来公元前473年越灭吴,宗国覆灭也可促使子游常年居鲁,故崔说并不成立。说到遗迹,子游若为鲁人,何以除武城外,鲁地再无其遗迹?而音韵角度的通假声转说服力有限,曹氏‘郟人’之说不能成立”^④。王若诗同样认为《礼记·檀弓》篇所记“越人来吊”之“越人”应该为言子。推测公元前473年越灭吴之后,子游自鲁回乡安顿家人,因听闻将军文子之丧,从已归属越国的故乡出发去往卫国吊唁,也有可能子游是在归鲁之后听闻讣告,再自鲁适卫行吊丧之事。因此,卫人和此章的记载才会称子游为越人。

关于言子年龄,杨朝明、卢梅通过考证有新发现。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同文书局石印影宋抄本及台湾中华书局影印宋属本三种《孔子家语》中,均有言子比孔子小三十五岁的记载,同《史记》记载相差了十岁,而此类版本中关于孔子其他弟子年龄记载也有相差十岁的例证,所以“这并非偶然,很可能是传抄中

出现的讹误。古时,二十、三十、四十分别写作‘廿’‘卅’‘卌’。在辗转传抄的过程中,字形相近的字出现讹误是一种正常现象”^⑤。清人梁玉绳、朱彝尊也认为《孔子家语》的记载比较合理。^⑥杨朝明、卢梅另有“子游生年考”专题,认为《孔子家语》的记载应当更为准确。二十、三十与四十的繁体字形比较接近,文本传抄过程中多一笔或少一竖实属难免。从前面的研究看,言偃、澹台灭明、高柴、宓不齐、樊须、有若、梁鱣、颜辛八人都属这种情况。^⑦王承略举例说明孔子弟子樊须的年龄应是《史记》在传抄时“漏掉一竖”,造成与《孔子家语》记载的差异。^⑧这些研究成果较好地回答了曹建国对言子年龄及言子籍贯问题的质疑。

近年来吴地常熟推动言子研究,其中也有关于言子籍贯的讨论。如陈颖为南宋朱熹与常熟知县孙应时,魏了翁、袁甫与知县王爚上下联手,推动明确言子籍贯为常熟和子游传统复兴这一学案,提供了诸多有效证据。^⑨朱熹的《平江府常熟县吴公祠记》以《史记》和《图经》所记为据,认为言子为常熟县人,“盖不诬也”。^⑩另有当地近期出土的墓碑《唐故施府君墓志铭并序》和《唐奚君故夫人陈氏墓志铭并序》,铭

- ① 曹建国:《论传世文献中所见子游及其思想》,《齐鲁文化研究》第12辑,第122-129页,济南:泰山出版社,2012。
- ② 高华平、沈月:《“七十子”与儒学在江南的传播》,《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 ③ 邹旭光:《子游其人及其学术要旨》,《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 ④ 王若诗:《再论子游及其“弦歌之治”》,《诸子学刊》第二十四辑,第106-12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
- ⑤⑦ 杨朝明、卢梅:《子游生年与〈礼运〉的可信性问题》,《史学月刊》2010年第7期。
- ⑥ 详见[清]朱彝尊:《孔子弟子考》,第8页,台北:广文书局,1951;[清]梁玉绳:《史记志疑》,第121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 ⑧ 王承略:《论〈孔子家语〉的真伪及其文献价值》,《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 ⑨ 陈颖:《南宋言子籍贯落地常熟的学案考察》,《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23年第1期。
- ⑩ [宋]朱熹:《平江府常熟县吴公祠记》,陈颖主编:《常熟儒学碑刻集》,第3页,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7。

文明确写作时间分别是“大中五年”“大中六年”，即公元851年、公元852年。前者铭文中“生兮言偃之侧，没窆虞山之东”，后者墓志说“以当年八月三日窆于常熟县言偃乡，买刘野者地建茔”^①，其中“言偃乡”即为当时常熟县，县址在今常熟市福山镇，而此墓碑即出土于福山镇。以上墓志透露出在唐代大中年间，常熟就有“言偃乡”之地望，不说县名而说言偃乡，说明言偃在当时当地的影响。

第二，关于子游文学的研究——文章博学到游夏文学。孔子把十哲之言子归“文学”科，后代评价言子“以文学著”。这就使得正确理解“子游文学”之“文学”成为一个重要话题，因这关涉言子的形象定位、思想定位和历史地位。朱熹在为吴公祠撰记时说“其所谓文学，固宜有以异乎今世之文学”，提醒人们重视言子之“文学”的涵义。诸多学者论述过此话题，至今仍歧见迭出。近期研究者仍然关注这一话题。

传统把“子游文学”狭义理解为“文章博学”，近期文章并不赞同。余来明说：“近代学术体系中作为独立学科门类的‘文学’，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存在‘文献经典’‘文章博学’‘学问’等义，又或被用以指代‘儒学’‘理学’，虽为‘孔门四科’之一，却并未形成独立形态。”^②王齐洲认为，孔子“四科”中的“文学”，“不仅标示着中国文学观念的正式诞生，而且赋予了这一观念以特定的思想文化内涵。从社会学的角度而言，文学是孔子对西周以来社会上层建筑的一种概括；从教育学的角度而言，文学是孔子培养人才的一种类型；从政治学的角度而言，文学是孔子鼓励学生从政的一种方式；从文化学的角度而言，文学是孔子对儒家文化学术的一种指称。孔子文学观念的这种普泛性正反映着春秋末期社会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还没有得到分门别类发展的客观事实，同时也开启了中国文学思想发展的先河”^③。李泽厚从《论语·学而》中得出结论：“这两章都鲜明展示出孔学儒家的‘学’，主要指现实的实践行为，而非书面的诵读研究。因此‘学’在《论语》以及儒学中有广狭两义。狭义才指‘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学’，即指学习文献知识，相当于今天的‘学’：读书研究，等等，孔门当然也非常重视。但整个讲来，

孔门更强调的是广义的‘学’，即德行优于知识，行为先于语言。”^④以上学者均把“子游文学”之“文学”概念作了广义理解，突破了“文章博学”的狭义理解，提供了对“文学”全新阐释的可能性。

关小彬认为学术界对于孔子定名之“文学”充满了好奇，在古人注释的基础上，学者尝试从不同角度切入，求其本义，或曰其为古代典籍学术，或推测其是有关礼仪制度的学问，或解释其为能付诸政治实践的文治教化学问。诸多不同观点有些看着相去甚远，却为进一步深入探讨“文学”本义提供了线索。关小彬认为孔子之“文学”是指“探讨礼之义理的学问，其目的是使人之行为合乎义理，才能够在当时的礼乐社会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以此分析《史记》记载子游为武城宰一事，“可以发现司马迁记述的重点并不在于子游如何以礼乐教化百姓，而在于他对老师质疑的回应上——‘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毫无疑问，这正是他以礼乐教化百姓这一行为的义理所在，同时也是他获得孔子赞许的地方。孔子和司马迁对子游的‘文学’之称，当原本于此”^⑤。程章灿认为先唐人根据《史记》所记的语言逻辑，把“文学”理解为“礼乐之学”。^⑥王齐洲明确提出：“孔子所谓‘文学子游子夏’之‘文学’是指以礼乐文化为核心的文治教化之学，这不仅可以从子游子夏的立身行事中得到验证，还可以从孔子的思想言论中得到说明。”“孔子称许

① 以上两方墓碑均为常熟文史专家周公太发现，前者已经载入中国文物研究所、常熟博物馆编：《新中国出土墓志（江苏常熟）》，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后者未见任何著录，碑现存常熟博物馆。

② 余来明：《在历史中理解“文学”概念》，《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3月28日。

③ 王齐洲：《中国文学观念的发生》，《光明日报》2013年10月14日。

④ 李泽厚：《论语今读》，第3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⑤ 关小彬：《孔子及其时代的“文学”观念》，《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1月2日。

⑥ 程章灿：《先唐人的言子记忆》，陈颖主编：《言子思想的当代传承和价值》，第44页，扬州：广陵书社，2021。

子游、子夏有文学之长既是对他们为学趣向的一种概括,更是对他们政治实践能力的一种评价,一种期待。事实上,子游后来在作武城宰的政治实践中表现出了善于以礼乐教化民众的特长,而子夏后来也在自己的教学活动中表现出了善于传授儒家文化典籍的才能。尽管孔子所谓文学是包括礼乐典籍知识和礼乐政治实践两方面内容的文治教化之学,其侧重点毕竟在于政治实践方面,而子游的政治实践能力显然高于子夏,因而孔子称文学便首推子游。”^①应该说,王齐洲对于“游夏文学”之“文学”的发微鞭辟入里而富有创意,其成果具有突破性,是能够被人接受的。

许霆、陈颖还原孔子提出“游夏文学”的语境现场,认为孔子提出“四科”“十哲”是从为政治国着眼而谈,孔子谈“游夏文学”是从其仁政德治、礼乐教化才能方面说的,其原意是子游、子夏两人如有机会从政,则会在文治教化方面充分显示才能,取得卓著政绩。就子游来说,其特长就是“特精于礼乐,以文学著名”。“子游学礼乐以入道,因此‘学至于子游,具孔子之一体矣’。这就是精于礼乐、以文学著名的子游在孔门中的地位,也是‘子游文学’在孔门中的独特地位。”^②这种分析,不仅赞同王齐洲对“游夏文学”的发微结论,即“文学”是指“以礼乐文化为核心的文治教化之学”,且肯定了子游的形象特征,自然地把“特精于礼”和“文学著称”两者有机结合,构成了对言子思想和为学特征的总体认知。

由辨析“游夏文学”的“文学”之义,把研究延伸到言子评价问题,这也是不少学者的研究路数。朱熹曾认为十哲中除德行科弟子外,其他三科皆“短于才”,台湾学者李卓颖对此观点作出论辩,他引常熟乡贤李杰《西碑亭记》中的话:“常熟自言游氏北学圣门列于文学之科,盖古之立言而庶几乎立德者,使其大用于时,则礼乐文化不但施于武城,而皋夔稷契之功,可立致矣。”他又称:“这一段话,使用了德、功、言三个概念来说明子游事实上具备了这三种修为。其巧妙处在于它们正好可以涵盖或模拟于孔门四科除了文学以外的德行、政事、言语——即使‘言’并不一定仅指言语。按照李杰的论述,

子游并不像朱熹说的‘短于才’,恰恰相反,子游是一位无所短缺的孔门高弟。……常熟人可以依据子游来检视包括理学宗师在内的各种人物。这是一个对子游之为常熟先贤,并可充分为后人所取法的极有自信的态度。”^③他认为恰恰是优秀的子游让苏州有了在地传统的心理优势和文化自信。历史上不乏认为“文学指博学古文,故比三事为泰,故最后也”^④。王晋玲对此提出疑问,通过转引北宋邢昺《论语注疏》、夏竦曾《曾参不列四科论》、清戴望《戴氏注论语》中相关论述,认为:“从上述所论,不能以言子从祀之序次,简单地、世俗地评鹭其在孔门弟子和十哲中之地位。作为亲炙弟子,他们是孔子思想的接受者、传播者、践行者,也是孔子思想体系建构的参与者、贡献者。……言子作为孔门唯一的南方弟子,除列名‘十哲’于孔庙,被通祀于全国外,还有专祠,分布于今江苏常熟、苏州与上海奉贤……多被列入祀典,成为言子崇拜及儒家文化精神与历史文脉的重要象征。”^⑤这种评价,恰当地肯定了言子在孔门的地位,肯定了言子在中华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

第三,关于言子思想的研究——子游氏之儒与礼乐化教。近出战国楚简的研究,推动了言子思想研究的展开。这里就言子思想整体评价和专题研究、言子相关文本研究和文献整理等方面综述近期言子思想研究的新进展。

其一,言子思想整体评价。戚福康认为言子在礼的价值取向、社会功能和情感控制等方面发展了孔子礼学思想。他认为:“可以对先秦儒

① 王齐洲:《游夏文学发微》,《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② 许霆、陈颖著,常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常熟市对外文化交流促进会编:《言子与江南文化》,第167页,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22。

③ 李卓颖:《地方性与跨地方性——从“子游传统”之论述与实践看苏州在地文化与理学之竞合》,《国际青年学术会议暨第二届清华青年史学论坛论文集上》,2010。

④ [南朝梁]皇侃著,高尚矩校注:《论语义疏》,第195页,北京:中华书局,2023。

⑤ 王晋玲:《言子列名“十哲”从祀孔庙考述》,陈颖主编:《言子思想的当代传承和价值》,第130页,扬州:广陵书社,2021。

学的流传小结为:孔子儒学,子游氏之学,子思之学,孟子之学。而在儒学流传的过程中,子游地位的重要性是可想而知的。”^①邹旭光认为:“子游氏之儒的学术要旨,《荀子·非十二子》揭示了端倪。该文把子思、孟轲所‘唱’‘和’的学说,归于先君子仲尼、子游之言,主要有两条:一条是‘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一条是‘略法先王,材剧志大’。”^②何益鑫认为言子在儒家道统中的地位可以表述为:“子游是孔门后期弟子的代表人物,是儒家心性之学的肇端。……它开启了思孟心性论,其具体形态又有别于后者,可称之为‘性情一心术论’。如果说《论语》等所见的子游重本的倾向,是子游之学的早期发端,那么,《性自命出》的‘性情一心术论’,则是其长期沉潜之后的展开形态……今日若重论道统,在孔子与子思之间,除了曾子之外,还应当有子游的位置。”^③蔡树才认为,子游学派“以礼践道、以道引礼”,是“通过礼乐教民治国,实现社会整体的自然和谐与全体成员的自我完善,而个体要投身‘礼’这种人伦与社会关系实践,顺应自然之情性与自然之礼;并阐述其中的原理,即情、性、道与礼乐的内在关系。所以只有子游才最为完整地发扬了孔子圣学,是与孔子理想最为接近的孔门传承”。^④王齐洲比较论说称:“子夏选择了传授儒家文化典籍的方式,试图以礼乐典籍知识来教育人,规范人的社会行为,达到礼乐教化的目的。而子游仍坚持用‘君子之道’来要求学生,要他们‘始终本末,一以贯之’,用他们的道德人格力量去影响社会政治。前者可以说是一条外放的路线,后者可以说是一条内收的路线。战国中后期的儒家代表人物孟子便倾向于后者,而荀子则倾向于前者。孟子以‘仁’释‘礼’,主张内省,‘求放心’,并且以‘不忍人之心’为其道德人格本体论的心理基础,显然奉行的是以本节末的内收路线。”^⑤

其二,言子礼乐思想研究。言子思想研究最为重要的专题是《礼运》研究,因研究文章特多,另作专题综述。言子礼乐思想研究是另一重要专题,学者杨朝明有《礼乐文明是中华民族的“不动产”》,朱利华有《言子〈礼运〉的道本思想》,於淑娟有《浅析传世文献中子游的礼学及贵情精神》,^⑥再有巫放《〈礼运〉是言子之学

的传承至宝》、王维生《君子之道,礼乐修身——言子礼乐教化思想的当代传承》等。^⑦许霆、陈颖把言子礼乐思想特征概括为:“将‘礼’与‘道’结合起来,用‘道’来指引、发展‘礼’,同时又以‘礼’来践行‘道’,即通过现实的礼乐政治教化,化易人性世俗,使得大道通行;将‘礼’与‘性’‘情’结合起来,缘情制礼,释仁入礼,又以礼治情,以礼节情,塑造完美的道德人格,使得礼乐文化成为深入人心世道的常理。其中,‘道’面向形而上的思想,‘礼’面向形而下的现实,‘情’面向生命体的个人,‘道’‘礼’‘情’三者结合成稳定结构,这是子游礼乐思想的基本特征。”^⑧关于言子礼乐教化实践研究,重要者有王若诗《再论子游及其“弦歌之治”》、言恭达《礼乐化教中的人文精神》、陈颖《言子与儒家的礼乐教化理想》等。^⑨言恭达强调:“礼乐化教中的传统人文精神应该而且必须向现代人文精神递进,追寻现代人文精神的历史性、社会性的转型。”^⑩李文娟有《子游:孔子礼学的践行者》,先论“子游礼学风格的形成”,包括“子游向孔子问‘礼’”“子游‘重性情’的礼学传统”;次论“子游对孔子礼学的恪守与践行”,包

- ① 戚福康:《言子儒学论略》,《学术交流》2006年第10期。
- ② 邹旭光:《子游其人及其学术要旨》,《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 ③ 何益鑫:《儒家心性之学的转出——论子游的思想创造及其道统地位》,《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 ④ 蔡树才:《子游思想述考——结合出土楚简文献的探讨》,《华中学术》2014年第2期。
- ⑤ 王齐洲:《游夏文学发微》,《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 ⑥ 以上三文见陈颖主编:《言子与江南文化》,第7-10、123-126、149-157页,扬州:广陵书社,2023。
- ⑦ 以上两文见陈颖主编:《言子思想的当代传承和价值》,第193-202、289-294页,扬州:广陵书社,2021。
- ⑧ 许霆、陈颖著,常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常熟市对外文化交流促进会编:《言子与江南文化》,第22-23页,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22。
- ⑨ 以上三文参见:王若诗:《再论子游及其“弦歌之治”》,《诸子学刊》第二十四辑,第106-12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陈颖主编:《言子与江南文化》,第3-6、158-163页,扬州:广陵书社,2023。
- ⑩ 言恭达:《礼乐化教中的人文精神》,陈颖主编:《言子与江南文化》,第6页,扬州:广陵书社,2023。

括“恪守古礼的‘卫道士’”“礼乐治邑的‘武城宰’”；再论“孔子礼学思想的生命力”。^①吴蕴慧有两篇文章论言子的礼乐教化实践，对子游武城弦歌之政和晚年道启东南两大政治实践作了研究。^②

在言子思想研究方面取得重要成果的还有：钱文辉的言子慈善思想研究，李焯的言子人才思想研究，路则权的言子礼学理财思想，许霆、陈颖的言子美学思想研究和言子政德思想研究等。^③戚福康概括了言子“别具一格的教育思想”：“第一，他把孔子的‘有教无类’的思想推进为全民教育的思想，认为无论是‘君子’还是‘小人’，均应学道，接受教育。……第二，在教育学生，培养学生成才的目标上，言子认为应该培养学生胸怀大志，使学生从小就陶冶他们治国安民的道德操守的治国思想。……第三，言子教学虽仍以礼乐为主要内容，但他正视时代的变化，承认‘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的社会事实，因此，还让学生学习三代典章，以适应和改进治国施政的需要，与孔子耿耿于周礼学习确有所不同。”^④

二、言子研究的新进展与突破

20世纪90年代初，湖北荆门郭店出土了804枚楚竹简，其中730枚为有字简，其释文于1998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1994年收录有1200余枚上博简，2008年收录有2500枚清华简，整理的竹书相继问世，学者们通过对珍贵的战国竹简进行整理，与传世文献对比、校勘和分析，重新审视战国时期儒家、道家等的发展脉络，厘清诸子言论的原始语境，为研究早期儒家思想提供了新材料和新依据。随着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创新，学界突破传统经学框架，从文献考辨、思想阐释、地域文化等多维度推进研究，言子研究也生成多方面的突破性成果。

（一）文献考辨与文本新诠。郭店楚竹简的内容，主要是儒家和道家著作。其儒家部分，成书年代早于《孟子》，简中所论述的心性学说和伦理思想，属于孔子以后、孟子以前的时期，研究简书对梳理和理解儒家思想从孔子时代向孟子时代转变、过渡的情景大有帮助。战国文献出土激

活传世经典，又与传世文献互相印证和补充，引发了学界对言子相关文本的重新阐释。

首先，有关《性自命出》的研究。学界普遍认为，它是先秦从孔子“美学”到思孟“美学”的一个中介，《性自命出》的“美学”实际上是心性论的“美学”、美情的“美学”，主要研究成果参见庞朴、李天虹、王振复、陈立群、姚永辉、李加武等的相关论文，从哲学、社会学研究视角阐释文本，提供思路。^⑤

其次，对《论语》“子游问孝”章的研究。如诸凤娟认为“子游问孝”所蕴含的孝道内在性，“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自我约束，不是外在律令所强加的，是自己通过修身养性而达到的，自觉遵守的，类似于绝对命令、绝对律令”，因此，“‘孝’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要有行动的行动实践，另一方面更要有内心的真挚情感流露，二者缺一

① 李文娟：《子游：孔子礼学的践行者》，《第六届世界儒学大会学术论文集》，2013。

② 吴蕴慧：《言子的礼学造诣及其对吴地文化的影响》，《安徽史学》2010年第4期；《武城弦歌——子游礼乐教化思想阐微》，《江淮论坛》2010年第5期。

③ 以上文献参见钱文辉：《〈礼运〉与慈善》，《中国政协报》2019年第7期；李焯：《言偃的人才思想》，江苏省常熟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南方夫子——言偃》，第150-158页，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15；路则权：《理财视域下的礼学略论——由言子礼学出发》，陈颖主编：《言子思想的当代传承与价值》，第207-215页，扬州：广陵书社，2021；许霆、陈颖：《言子的美情美学思想》，许霆、陈颖著，常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常熟市对外文化交流促进会编：《言子与江南文化》，第122-144页，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22；许霆、陈颖：《言子的政德思想研究》，许霆、陈颖著，常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常熟市对外文化交流促进会编：《言子与江南文化》，第163-179页，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22。

④ 戚福康：《言子儒学论略》，《学术交流》2006年第10期。

⑤ 庞朴：《孔孟之间——郭店楚简中的儒家心性说》，《国际儒学研究》第六辑，第241-25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李天虹：《〈性自命出〉与传世先秦文献“情”字解诂》，《中国哲学史》2001年第3期；王振复、陈立群：《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的美学意义》，《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姚永辉：《“以故兴物”考辨与发微：以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篇为参照》，《中国哲学史》2014年第3期；李加武、吴婧婧：《〈性自命出〉“情”义初探》，《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不可”。^①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子游问孝”对构建当代孝道文化的启示,要关注行孝中的情感因素,将亲情投入实际行动,而非强制植入的孝道仪式或道德绑架。李良强调“礼敬”,认为“礼仪的核心价值是‘敬’,即自重、自尊、庄严、有序”,“言子以敬交人,又因敬立功。……言子北上学儒,登观受礼,武城弦歌,倡以礼乐治天下。躬身实践,乱世求治,言子体悟了礼对于社会和谐的重要性,并将之付诸实践。此中,无论是从个人交往还是从政治实践来看,言子的所作所为皆表现出礼敬思想的价值内涵”。^②刘梦溪发表长文《敬义论》,论及“子游问孝”,并把“爱敬”作为中国文化最主要的价值理念,“发掘‘敬’之立义的学理内涵、精神旨归及对建构人的完整人格的深在意义”^③。张子峻认为:“中国古代孝观念在历史中,有一由‘敬’变异为‘顺’的权威化过程,同时,‘孝’思想的这一变异也逐渐渗入儒家知识系统领域,表现为思想史演变投射于学说史中。考稽文献,《论语》‘子游问孝’章的诠释历史最能透露这一变化趋势。”^④

再次,对简文《言游》篇的研究。《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八)》有《言游》篇,为研究言子思想提供了新的资料,围绕此简发表了较多研究文章。本篇原整理者濮茅左将其编为六简,题为《子道饿》,“简文充分反映了言游在势穷力困之际的儒行本色。孔子派弟子南下北上求救,与孔子跟诸侯、士大夫之间的交往有密切关系”^⑤。后人们又重新整理竹简,题为《言游》,认为记载的是子游在鲁受辱而奔往宋卫之时,其一子饿死,门人因此谏言。后李锐和廖名春也认为此篇记载的主要是子游事件,无关孔子厄于陈蔡。蔡树才也认为“其说可从”,并明确地说:“从内容看,本篇当为子游门人弟子记载子游关于士子食禄与德行修养关系方面的重要文献,也是有关子游‘礼’学思想的重要补充。”他认为其思想与孟子思想相通,“均言不能以‘犬马’来对待人,而《言游》同时表明子游学术以‘礼’来规范士子,反对不劳而获。《孔子家语·礼运》与《礼记·礼运》也都有‘力恶其不出于身’,嫌恶偷懒不用力气,当然这又反过来证明《礼运》确系子游学派的重要文献”。^⑥

(二)思孟道统与子游学派。庞朴认为,孔子后学分为向内求索与向外探寻的两种致思路数:“向内求索的,抓住‘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处,明心见性;向外探寻的,则从宇宙本体到社会功利,推天及人。向内求索的,由子思而孟子而《中庸》;向外探寻的,由《易传》而荀子而《大学》。……这批竹书(郭店楚简)属思孟学派著作,是早期儒家心性学说的重要文献。”^⑦由此开始,言子与思孟道统的关系、子游学派的思想阐释,都引起了学术界的持续关注。

对于郭店楚简儒书部分的具体归属,学界存在分歧。持谨慎态度的梁涛将其分成三类:第一类如《缁衣》《五行》《鲁穆公问子思》,肯定属于子思所作;第二类如《穷达以时》《性自命出》,倾向于将其看作子思与子游氏之儒的作品;第三类如《唐虞之道》《尊德义》《六德》等,可以认为是由子思到孟子的背景材料。^⑧张玖青、曹建国认为:“在近出楚简文献中,《性自命出》所阐发的思想及其核心概念均与子游有密切的关系,其中诸多文句可与《礼运》《乐记》^⑨等与子游学派关系密切的文献相参证。……如果属于思孟学派的《五行》与子游关系密切,这

- ① 诸凤娟:《孝道的内在性:从“子游问孝”说起》,陈颖主编:《言子思想的当代传承与价值》,第302-307页,扬州:广陵书社,2021。
- ② 李良:《言子礼敬思想刍议》,陈颖主编:《言子思想的当代传承与价值》,第295-301页,扬州:广陵书社,2021。
- ③ 刘梦溪:《敬义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 ④ 张子峻:《论古今视阈转换下孝观念的敬顺之变——以〈论语〉‘子游问孝’章的诠释史为例》,《理论月刊》2019年第2期。
- ⑤ 濮茅左:《〈子道饿〉释文考释》,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八)》,第119-12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 ⑥ 蔡树才:《子游思想述考——结合出土楚简文献的探讨》,《华中学术》2014年第2期。
- ⑦ 庞朴:《孔孟之间——郭店楚简的思想史地位》,《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
- ⑧ 梁涛:《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第14-1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 ⑨ 《乐记》的作者,学界普遍认为是七十子后学公孙尼子,陈来认为公孙尼或是子游的弟子,或与子游、子思属于同一学派。参见陈来:《郭店竹简之〈性自命出〉篇初探》,《孔子研究》1998年第3期。

说明思孟学派本身也与子游关系密切,甚或思孟学派与子游有直接的师承关系。……总之,子游学派与近出楚简中的儒家文献关系密切,对后世儒家尤其是以心性之学而著称的思孟学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①姜广辉认为,郭店楚简中《唐虞之道》《缁衣》《五行》《性自命出》《穷达以时》《求己》《鲁穆公问子思》《六德》诸篇为子思所作。“子游、子思、孟子一系‘弘道派’。孔子的‘大同’‘小康’之说系子游所传,这一派重视君臣、君民关系,它秉承孔子‘天下为公’的思想,主张‘君宜公举’‘民可废君’。”^②以上学者根据竹简内容,把其中部分文章归入子游或子思的名下。

荀子在《非十二子》中说:“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这为后人梳理了早期儒家道统的一条重要线索,亦即后人所称之“思孟学派”,宋儒则认为思、孟师法曾参。近期通过对楚简的研究,不少学者认为,确实存在儒学思孟学派,并同言子有着传承关系。“尽管传世文献对于子游及其后学的学术传承不清楚,但子游学派确实是存在的”^③,楚简中存在关乎子游,甚至是子游的作品。通过对《太一生水》《五行》《性自命出》等作品的研究,张玖青、曹建国认为:“子游是孔门弟子中最深于礼者,其重本践道,故深得孔子赞誉。其开创的子游学派应是孔子之后非常重要的儒学派别,它不仅继承光大了孔子形上之学,也开启了思孟学派心性之思,成为思孟学派重要的思想来源。与此同时,论学重形上的学术特质也拓展了子游学派的学术疆域,使之成为孔门后学中思想最为活跃的一派,从儒的立场对先秦后期儒道融合的学术大势作出了积极的回应。”^④丁四新说:“《性自命出》是郭店楚简中的一篇重要出土文献,对于它的创作时代与学派归属问题,学者们有多种看法,大多把它定为战国早期的思孟学派的作品。……而在思孟学派中以子思思想与《性自命出》篇最相接近,因而子思颇有可能是该篇简书的作者。”^⑤

梁涛撰书肯定思孟学派的独立存在,也肯定言子在思孟学派形成中的重要作用。他明确地说:“子游应该是对子思、孟子产生过影响的重要人物。子思与孔子年龄相差较大,不可能过

多地接受孔子的教诲,子思的父亲孔鲤亦早卒,所以较为合理的说法,子思应该是在孔子弟子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⑥廖群认为郭店楚简中的儒家著作“多是子思一系的著作”,他发现孟子学说在诸多方面与之有着传承关系,由此得出结论:“孟子的确已经深入接触研讨过子思一系的大量著作,从中汲取到思想源泉,并有所继承和发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先秦思想史上的确存在过‘思孟学派(统)’,这就是郭店楚简提供给我们的一个确定的结论。”^⑦廖群以楚简为据,说明思孟学派诸人均具浩然正气的文化人格,印证了郭沫若所谓言子“犹然而材志大”,“可能更教育出了一批‘犹然而材志大’的人物出来”。^⑧彭彦华认为,孟子的思想在哲学和伦理方面受孔子和曾子影响很大,而在政治思想和理想方面则受子游之惠极厚。她还指出,言子强调礼乐的重要性,但更重视礼之“道”,“重视礼,表现了子游对传统的看重,而强调礼之道,则又表现了他在看重传统的同时也在积极地防范其流弊,这也正是他在某种程度上大有胜过他人的地方,在某种意义上也正是孟子道统思想的滥觞”^⑨。

宋儒认为思孟师法曾子,近代学者普遍接受荀子梳理的思孟学派传承线索。近期论文仍然于此形成争论。石城通过对《孟子》中引述曾

-
- ①④ 张玖青、曹建国:《试论子游与近出简帛之关系》,《古籍研究》第1辑,第234-235、237页,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
- ② 姜广辉:《郭店楚简与〈子思子〉——兼谈郭店楚简的思想史意义》,《哲学研究》1998年第7期。
- ③ 王钧林:《中国儒学史》(先秦卷),第172-173页,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
- ⑤ 丁四新:《论〈性自命出〉与思孟学派的关系》,《中国哲学史》2000年第4期。
- ⑥ 梁涛:《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第3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 ⑦ 廖群:《郭店楚简与孟子研究》,方铭主编:《儒学与二十一世纪文化建设:首善文化的价值阐释与世界传播》,第477页,北京:学苑出版社,2010。
- ⑧ 郭沫若:《十批判书·儒家八派的批判》,郭沫若著,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二卷,第1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 ⑨ 彭彦华:《孟子道统思想溯源——兼谈子游对孟子的影响》,《社会科学战线》2023年第2期。

子、子思和子游言行的分析,认为:“孟子对曾子的引述最多,涉及的内容多与儒家的重要思想观念相关联。……在三人中,他对曾子最为重视。而子思,《孟子》书中涉及的话题相对固定,孟子多是围绕着他作为君师的地位来谈重士尊贤的问题。至于子游,至少在《孟子》这本书中,孟子对他缺乏认可。”^①但更多学者对此持不同看法。孟子曾说:“未得为孔子之徒,予私淑诸人也。”后代普遍认为孟子学于子思后人,而子思是在孔门多位弟子培养下成长的。从子思的思想看,主要传承的是曾子、言子的思想。梁涛在《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中,既叙述了言子,也叙述了曾子对子思以至思孟学派的影响。彭彦华、林国华认为,“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孟子以子思为阶梯,承接孔子”,同时接受了言子的思想影响,由此得出三点结论:“第一,对于孟氏之儒来讲,子思是它的‘道统’意义上的先师,而真正的‘学说’(学统)上的‘先师’却是孔子本人以及曾子和子游等孔子弟子。第二,孟子对子游和曾子之学的承继和借鉴,并不是直接的和全面的,他只是利用了游、曾二子学说中的某些可以接受的观点。……第三,不可遗漏的另一要点是,荀子在《非十二子》篇中所攻击的并不是孟学本家,而是孟子的后学”。^②这种分析是理性科学的,也就颇具说服力。於淑娟的研究结论是:“子游是孔门‘十贤’之一,并受到孔子的赞赏,而其他弟子则或多或少地受到过孔子的批评。另外,作为孔子的后进弟子,在孔子死后,子游一直在鲁活动。而当时子思年纪尚幼,所以如果选择一位老师,子游有非常大的可能性。出土的《子道饿》和《性自命出》也说明了两者在思想上相承续的脉络。所以子思应该师承的是子游而非他人。”^③何益鑫认为:“《性自命出》所展示的人性发生学、‘性情一心术论’的思考道路,对先秦儒学的后续发展曾有过决定性的影响。一个重要的方式,是通过子思的继承。……从郭店竹简《五行》看,其对人的内心现象及其变化过程的理解,确实比《性自命出》更为细腻。但不可否认的是,两者无论其道路还是宗旨,都有内在的继承关系。故我们可以说,子思虽或与曾子有过师生之谊,但其代表性的思想则是继承和推进了由子游所开创的思想道

路。换言之,子游所开创的思想道路,对于先秦儒家思孟学派的发生,对于心性之学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子游视为孔子、子思之间儒学思想发展的中间环节。……但我们不是说,子思传子游,不传曾子。其实,在孔子与子思之间,究竟是曾子还是子游,要从不同方面说。”^④这也是科学理性的态度。

明确了子游学派的存在,不少学者探讨了这一学派的特征。现代大儒熊十力如此叙说孔子思想流变:“(孔子)早年好古,有‘述而不作’之意。三千弟子中,诸年长者承其风而乐之,执古之礼而莫知变。其流,遂为小康学派。晚年创明大道,有‘裁成天地,辅相万物’之猛志,始作《六经》,启导下民革命。三千中诸狂简高才,承其风而兴起。虽其道难行,而不易其志。其流,遂成大道学派。”^⑤又说:“孔子大道之传授,今据《史记·仲尼列传》,可考者仅二人。一、言偃,字子游。……二、卜商,字子夏。……二子皆孔门之青年。”^⑥他认为子游接受了孔子大道思想,其标志是《礼运》篇,从而把子游一系归入“大道学派”。我们认为,“大道”思想确是子游礼乐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居形上的地位,它主要反映在《礼运》篇中。另如金其桢把“子游氏之儒”的基本思想概括为:以“礼乐”教民治国的思想,建立“大同”“小康”社会的思想,“孝”必“敬”的思想,育人、用人要重本贵德的思想等。^⑦何益鑫说:“在《性自命出》中,子游展示出了一条以人性发生学为根底的,以天、命、

- ① 石城:《〈孟子〉引述子思、曾子、子游考——从〈孟子〉看孟子的师承》,《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4年第8期。
- ② 彭彦华、林国华:《孟子道统思想溯源——兼谈子游对孟子的影响》,陈颖主编:《言子与江南文化》,第14-35页,扬州:广陵书社,2023。
- ③ 於淑娟:《从〈子道饿〉〈性自命出〉看子游与子思的师承关系》,《鄂州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
- ④ 何益鑫:《儒家心性之学的转出——论子游的思想创造及其道统地位》,《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 ⑤⑥ 熊十力:《乾坤衍》,第81、40-41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
- ⑦ 金其桢:《略论“子游氏之儒”》,《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性、情、道、义等为逻辑环节的新的思想道路。此道路,贯通天人、内外,融摄了《诗》《书》礼乐,经由‘心术’的工夫,归于‘生德于中’的宗旨。它在继承孔子之学的德教本质的同时,为教化的必要性和方式作出了新的论证,也为后人讨论人性、性情、心性等问题提供了思想框架。”^①这是从子游在先秦儒家道统中的地位出发概括而言的,给人以重要启示。孔平生对荀子指称子游氏之儒为贱儒有着独到认识,认为“荀况批判言偃绝非简单的流派之辨,实质上反映了荀况所处时代价值整合并重新选择的深刻脉络。研究这一脉络,对于重新发现言偃的当代价值具有积极意义”,“荀况批判包括言偃在内的儒学各流派,是适应战国即将进入‘壹天下’的政治需要”。^②这种研究具有广阔的学术视野。

(三)礼乐实践与历史地位。“文开吴会”“道启东南”“南方夫子”等,概括了言子在中华文化史上的地位和贡献,如何在当代新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明确言子的历史定位,界定言子的历史功绩,确立言子的先贤形象,阐发言学的当代意义,成为当下言子研究的重要任务。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语境下,言子在中华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得以充分彰显,《礼运》篇大同、小康思想的当代价值成为研究热点。学术界对言子礼乐思想与实践的历史贡献同样持肯定意见,杨朝明在“2022 虞山文化论坛”发言中表示,中华礼乐文明历久而弥新,礼乐研究也应与时俱进,必须正确认识礼乐并妥善行用礼乐,秉承返本开新的历史使命,深入挖掘礼乐的内涵及与时代需要的关联,将研究目光聚焦于礼学经典的诠释、礼乐精神的阐发与礼乐文化的现代转化上来,通过对礼乐文明进行正本清源和深刻体察,将礼的真精神切实贯穿于具体施行中,让传统礼乐文明真正焕发生机与活力。^③这段话无疑推动研究者关注言子礼乐实践的历史贡献。

姜广辉研读郭店楚简后,对孔门后学分派重新划分。他认为所谓思孟学派是指子游、子思、孟子一系的“弘道派”,“在早期儒家之中,这一派人民性、主体性、抗议精神最强,是早期儒家的嫡系和中坚”^④。他进一步分析,“以孔子、子游、子思、孟子为代表的儒学之‘道’,主要是

就上述‘大同’说、‘禅让’说、贵‘情’说而言的。‘大同’说反映了他们的社会理想,‘禅让’说反映了他们的政治思想,而贵‘情’说则表达了他们的人生哲学。这三个方面可以视为孔孟儒学的真正‘道统’”^⑤。这一儒学思想体系主要由思孟学派所倡导、所发扬,并在今日依旧显示出积极的意义。王新春认为言子在中华文化历史上的贡献,都是与孔子思想密切相关的,“言子以其掌握的大量文献,对儒门的文化传承、道统传承、政道治道进行了有益探索……言子的贡献与孔子的贡献一道开启了中华文化的独特发展方向,这一方向在当今时代经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之后,对于中华文化的未来走向,具有重大启迪借鉴意义”^⑥。董金裕把言偃在儒学史上的地位归纳为“南人北学,促成儒学南传”“娴熟礼乐,以之教化百姓”“笃学好问,与闻大同理想”,因此,他认为,“子游在儒学史上的地位,实难有人能望其项背。……子游生前声光并不甚显,但他在儒学史上既有其不可磨灭的地位,实不容我们漠然视之”。^⑦以上是对言子及其学派在中华文化史上的贡献和地位的论述。

学界对言偃晚年道启东南的历史地位有了新的认识。从言子礼乐实践看,蒋伟国把言

- ① 何益鑫:《儒家心性之学的转出——论子游的思想创造及其道统地位》,《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 ② 孔平生:《评荀况批判言偃及言偃思想的当代价值》,陈颖主编:《言子与江南文化》,第113-116页,扬州:广陵书社,2023。
- ③ 杨朝明:《礼乐文明是中华民族的“不动产”》,陈颖主编:《言子与江南文化》,第7-10页,扬州:广陵书社,2023。
- ④ 姜广辉:《郭店楚简与〈子思子〉——兼谈郭店楚简的思想史意义》,《哲学研究》1998年第7期。
- ⑤ 姜广辉:《郭店楚简与道统攸系——儒家传统重新诠释论纲》,《中国哲学》第21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 ⑥ 王新春:《言子的历史贡献与孔子思想——兼论中华文化的未来走向》,陈颖主编:《言子思想的当代传承和价值》,第87-88页,扬州:广陵书社,2021。
- ⑦ 董金裕:《孔子唯一南方弟子言偃在儒学史上的地位》,陈颖主编:《言子思想的当代传承和价值》,第62-71页,扬州:广陵书社,2021。

偃视为“闻道的求学者”“儒宗的传承者”“守正的主政者”。^①曹培根把言偃在儒学文化史上的贡献概括为“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和藏书家”^②，“言子在承前启后、交融南北文化、推进江南文化在新的起点上实现突破性转型发展方面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他认同“言子文化作为整个儒学在江南发展的源头”的提法，认为“言子不仅开启了儒学在江南的传播，而且促进了儒学在江南的创新发展”。^③巫放把常熟三位古圣贤巫咸、仲雍、言偃并列，认为：“（他们）分别体现了巫史文化、礼乐文化和儒家文化，三位常熟古圣贤一脉相承，并且是一个前后相继的整体……三位古圣贤亲民仁爱，秉政廉明，言行谨细，风格典雅，这也是江南文化的重要内容。”^④高华平、沈月则重点分析了子贡、子游、澹台灭明在江南传播儒学的实绩，揭示了早期儒家学说南传与江南文化之间的关联。^⑤徐忆农高度评价言偃南归传道对中华文化的贡献，他说：“仲雍协兄让国南来与言偃北上入孔门学习儒学，为江南开创了文明之春，使江南文化有机会因吸收中原文化而成长，进而对构建中华文化新格局产生重要影响。……今天，常熟先贤仲雍与言偃之所以受到万人景仰，正是因为他们对中华文化的生生不息作出了辉映三千年历史时空的伟大贡献。”^⑥这种对言偃在江南文化史上贡献的评价，成为言子研究的重要突破性成果。

在言子影响的研究中，数位学者还就国家和地方崇言奉祀展开研究。李峰《言子祠祀地域以及政治文化内涵》、王晋玲《言子列名“十哲”从祀孔庙考述》、房伟《言子从祀文庙考》，^⑦李峰、王晋玲《言子专祠与名人崇祀的历史观照》，^⑧贺晏然《常熟言氏与清代先贤言子祭祀的展开》等，^⑨从纵的历史线索和横的空间线索，叙说了各地建祠祀言、言子文庙从祀的情形，揭示了言子祠祀的丰富文化意义。

（四）文化认同与文脉符号建构。吴地常熟是言子的故乡，更多地受惠于言子思想和子游传统的影响。近年来，常熟重视言子研究，取得重要的研究成果，突破“北学南渐”单线叙事，关注言子如何在吴地传承周礼、“因俗制礼”，逐步将中原礼乐与江南水乡本土文化融合，后人

尊言学贤活动揭示其“礼俗互动”的实践路径。常熟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写了关于言子及子游传统的四本著作：《让国南来——仲雍》《南方夫子——言偃》《常熟状元》《虞山文化流派》。常熟文庙在历史中形成了东、中、西三条南北纵向轴线，其东轴线则是言子专祠和崇圣祠，礼制空间布局在全国独具特色，言子专祠被定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陈颖、许霆出版了《常熟文庙研究》，就此话题展开研究。更多学者结合常熟自南宋以来形成的尊言学贤历史传统，研究子游传统在常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话题，研究言子思想的当代传承，推动地方文化传统的弘扬。许霆、陈颖著有《言子与江南文化》，发表了“言子与江南文化”系列文章。蒋伟国出版了《百世风骨：言子家族文化及其遗产》，包括“言偃及言氏家风研究”和“言子文化遗产录”两辑。许霆与李焯合作出版《言子与常熟文化》，重在研究南宋以降常熟的尊言学贤历史传统，其研究意义可以表述为：通过揭示常熟文化历史渊源，回答“我们从哪里来”的问题，以增强文化自信；通过概括常熟文化特质内涵，回答“我们是怎样走过来”的问题，以增强文化自觉；通过昭示常熟文化新走向，回答“我们将走向哪里”

- ① 蒋伟国：《言偃历史贡献探析》，《百世风骨——言子家族文化及其遗产》，第21-3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
- ② 曹培根：《言偃在儒学文化史上的地位》，《书海人影》，第13-24页，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8。
- ③ 曹培根：《关于言子及其历史地位的思考》，陈颖主编：《言子与江南文化》，第56-57页，扬州：广陵书社，2023。
- ④ 巫放：《常熟古圣贤与江南文化》，陈颖主编：《言子与江南文化》，第71页，扬州：广陵书社，2023。
- ⑤ 高华平、沈月：《“七十子”与儒学在江南的传播》，《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 ⑥ 徐忆农：《融南纳北：江南与中原文化之关系——试论仲雍与言偃对中华文化的历史贡献》，《钟山风雨》2017年第2期。
- ⑦ 以上三篇均参见陈颖主编：《言子思想的当代传承和价值》，第112-120、121-133、134-148页，扬州：广陵书社，2021。
- ⑧ 参见陈颖主编：《言子与江南文化》，第98-112页，扬州：广陵书社，2023。
- ⑨ 贺晏然：《常熟言氏与清代先贤言子祭祀的展开》，《苏州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

的问题,以推动文化创新。

江南文脉的符号建构有:苏州大学建成“吴文化数据库”,苏州职业大学结合研究建有吴文化园,探究吴文化的数字化、具象化创新传播路径。苏州、无锡、上海等地将言子塑造为“江南儒学之源”,通过修缮言子祠、举办学术论坛、开发文旅线路,推动地方文化品牌建设,如苏州常熟连续举办“言子与江南文化”论坛,建设“言子故里”项目,结合数字化展陈、文庙祭祀组织演出大型歌舞剧《南方夫子》等,再现言子南传儒学的历史场景;奉贤全力打造南上海“贤美文化”,塑造新江南文化品牌,举办“‘贤’‘美’文化与江南文化”研讨会。

三、言子研究反思与展望

21世纪的言子研究,正从“地方先贤”走向“思想范式”,其“礼乐化俗”的实践智慧,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提供了重要资源。当下言子研究需要反思之处在于:一是文献不足与过度诠释的困境。一方面言子传世文献稀少,研究高度依赖仅存文本的片段记载,导致部分结论依赖推测,要严格区分研究史料与民间传说;另一方面新出土文献的解读需要谨慎,排除错简或误读,部分简帛是否直接关联言子,需要科学验证,避免牵强附会。二是思想史定位的再思考。首先,传统观点认为子游学派在战国后期式微,但近年研究提出其可能通过《礼运》等文献间接影响了汉儒;其次,言子是否被后世“边缘化”,言子的接受史研究亦是基本空白。张幼良教授提出建构“言子文学研究体系”,并设计了五大版块:一是言子文学的本体研究,二是言子文学的思想研究,三是言子文学的文化学研究,四是当代言子文学研究,五是言子文学研究和实践,^①这就为全面深入推进言子研究提供了思路。

笔者认为,当下言子研究有望从三个方面继续深化。

第一,言子文献挖掘性整理和汇编。相对于言子在中华文化史上的地位和贡献而言,言子研究依旧显得单薄和分量不足,表现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对言子及其思想的评价,以及尊言

学贤传统的传承有过变化或者中断,同时学术界也一直存在不同的声音。究其原因,是言子传世文献除了经过三次辑录增补的《言子文学录》之外,其他均散见于经史子集、地方志、书院志或碑刻铭文中,系统整理不足,传播利用不广。在言子故里江苏常熟,言子相关文献资料分别由博物馆、图书馆和文庙等单位保存;全国言子文化遗存则分布在相传言子游学传道踪迹涉足的苏州、上海、山东、浙江等地,不少实物遗存已随世事变迁消失殆尽,少数存在于方志、古籍记载中,研究者需要通过实地寻访、调研、文献搜索、传递等不同的途径获取相关资料,给言子研究、儒家礼乐文化思想研究及其当代传承研究等带来一定困难。学者程章灿说过,“先唐人对于言子的记忆,或者说,他们心目中关于言子的形象,构筑起了我们今天对言子的理解和想象的基础”^②,今人的研究确实会受到前辈研究的左右。由此,不少学者呼吁,言子文献的挖掘性整理和数字化保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可以给后续言子研究与江南儒学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历来言子研究资料建设薄弱,吴文化研究基地首席专家罗时进提醒说:“一种可持续的研究,必须建立在扎实、充分的文献之上,言子研究的深入自然也应循此规律。……言子文献如何活化,在今天的地方文化、文学研究中发挥作用,在更普遍的人文教育中古为今用,这是又一项有意义的工作。”^③

言子资料研究工作已经取得不少成果,出版了《言子文学录》([清]言如泗增辑)、《江南言子故里碑刻集》(常熟碑刻博物馆编)、《常熟儒学碑刻集》(陈颖主编)、《常熟言氏家谱资料二种》(李焯、付凤娟整理)、《言子研究文集两种》(陈颖主编)等;已经发表了《言子文学录》([明]侯先春辑,[明]耿橘注,朱原谅点校)、《虞

① 张幼良:《言子文学研究体系断想》,陈颖主编:《言子思想的当代传承和价值》,第167-177页,扬州:广陵书社,2021。

② 程章灿:《先唐人的言子记忆》,陈颖主编:《言子思想的当代传承和价值》,第47页,扬州:广陵书社,2021。

③ 罗时进:《活跃言子研究的学术思维》,陈颖主编:《言子与江南文化》,第13页,扬州:广陵书社,2023。

山书院志各志序集编》([明]张鼐撰,朱原谅、方忆涵点校)、《2000—2020年言子研究文献辑目》(朱原谅辑)、《古代诗歌中的言子》(张幼良校辑)、《言子文化遗产录》(蒋伟国撰)、《言偃暨孔门师生大事系年》(蒋伟国编)等文献资料。常熟理工学院和常熟言子研究会还将继续做好言子文献资料汇编工作,包括《言子文学录新编集释》《文献典籍中的言子》《新编言子文学录集注》《言子研究题录与综述》《言子文化古迹资料辑》等。

第二,言子接受史研究。纵观学术研究史,言子及其礼乐思想存在于典籍文献中,传播度和接受度并不高,表现在与孔子诸位弟子相比,言子及其后裔并未得到历代朝廷的重视与荣养,在后世并未得到相应的社会地位。直到南宋时期朱熹与常熟知县孙应时,魏了翁、袁甫与知县王爚上下联手,明确言子籍贯为常熟,大力推动复兴子游传统,言子及其礼乐化教思想才被当地民众和朝野逐渐关注。南宋末年常熟县令王爚辑成《言子》二卷(失传),力图在言子故乡掀起尊言学贤的风尚。明万历年间知县耿橘重建虞山书院,建言子祠供奉先圣,制言族六礼,振兴言氏一脉,侯先春增辑、耿橘注《言子文学录》一卷。至此,经过明朝众多官员以及言氏子孙的不懈努力,清康熙年间言子终于得到重视,朝廷授予子游后裔世袭五经博士的荣养地位。清末民初一批思想家如康有为、熊十力、梁启超等关注《礼运》之大同理想,相关阐释亦是聚焦在孔子思想的传承和古为今用上。20世纪80年代台湾地区曾掀起孔子研究热,对其提出的大同、小康社会理想进行热点研究。随着20世纪一批战国竹简的出土,子游与《礼运》篇等相关文本再次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研究集中在言子的籍贯、年龄,《礼运》篇的作者及成书年代、学派归属、思想内涵等方面,学术争论一直存在。有学者力证《礼记·礼运》篇确系“子游氏之儒的主要经典”,是儒家礼乐思想的经典文本。《礼运》篇的大同、小康社会理想与21世纪的“中国梦”同频共振,近二十年来言子及其相关研究论文超过200篇,学者普遍认为以“礼运”为代表的儒家礼

乐思想,其社会发 展观、小康理想观、惠教结合观、选拔人才观等,在21世纪依然值得我们结合时代特征进行阐发与借鉴。

然而,关于言子思想的接受史研究仍是薄弱环节,当下言子研究可以聚焦于此,通过展现言子言论、思想、评价在不同时代的传承演变,尤其是江南尊言学贤传统的演变历史,以及其与江南经济社会发展兴衰和文化繁荣的交互关系,进而为充实中国儒学发展史研究增加重要版块。接受史研究主要侧重言子对江南文化的影响研究。通过言子接受史研究,理清江南尊言学贤传统的历史承继,我们就能知道江南文化的历史渊源、特质内涵,增强文化自觉、推动文化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在新的起点上,继承和发展中华礼乐文明,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把跨越时空、富有永恒魅力的、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努力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第三,跨学科方法与技术应用。其一, GIS与历史地理学结合,通过地理信息系统还原言子北上求学和南归传道的路线,分析交通网络与思想文化传播的关系,如以言子传道为例,从太湖流域水路分布探讨儒学在江南的传播扩散路径;其二,跨学科交叉研究,可以结合语言学、社会学、人类生态学和哲学等多重视角,推进言子及其思想研究,重塑江南儒学版图;其三,数字人文与文本挖掘,利用语义网络分析言子相关文本,可视化其概念关联,深化比较研究,揭示“礼”“乐”“情”等核心范畴的思想结构,建立“言子文化专题数据库”,整合文献、图像、考古数据,开发互动式数字展览,推动言子研究学术成果向公众传播。

【本文系教育部社会科学司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项课题(A类)重点项目“言子文献整理研究”(23JDTCA005)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燕,常熟理工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近现代作家作品、地方文献整理。